

# 论农业耦合侵权及其社会化救济

熊 闻, 王育才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杨凌 712100)

**摘 要:** 近年来, 频发的农业环境侵权和农产品安全事故已引起我国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然而, 现行法律制度对农产品致害侵权规制失焦, 分配弱势受害人较一般侵权人更多的道义可责难义务, 削弱了法律的评价作用。对农产品致害侵权的耦合性的研究, 可为兼顾农产品致害侵权行为主体双方利益平衡找到答案: 农业环境责任保险是重要的出路。

**关键词:** 农产品安全; 耦合侵权; 社会化救济; 农业环境责任保险

**中图分类号:** D912.4; S-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4)06-0013-07

## On the Agricultural Coupling Torts and the Socialized Relief

XIONG Wen, WANG Yu-cai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712100,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 serie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safety incidents have aroused great concern of the whole society. However the existing legal regulation fails to adjudicate properly the damage tort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thus distributing more moral responsibility on the weaker infringer than general ones, and worsening the evaluating function of law. The study on agricultural coupling torts can help us to find an approach, that is, the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insurance, to balance the interests between the infringer and victim.

**Key words:** agricultural product safety; coupling tort; socializing relief;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insurance

2013年3月20日,《河南商报》报道了一篇令人震惊的新闻:新乡市小块村村民直接用未经任何处理的工业废水灌溉麦田。这些废水由当地的东风造纸厂排放。检测人员现场取水化验发现:水中化学需氧量(COD)浓度高达28400 mg/L,超过国家《污水综合排放标准》93.6倍。当地村民表示村中早已没有干净的水源,如需使用处理后的水灌溉则需另外付费。对于小麦销售的对象,村民直言不讳地说:“都卖给你们了,自己是不吃的。”这个“你们”当然是指广大的消费者。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试想,这样的毒小麦流入市场,走上餐桌后果将是多么可怕!农产品

安全事件的频发使笔者对农产品进行关注。对于消费者因食用有毒有害的农产品致害的侵权案件该怎么处理,我国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理论研究也未形成通说。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陷入了既不能诉诸于现有法律制度以寻求救济,也不能完全交给市场解决的困境<sup>[1]</sup>。

### 一、农产品及其法律规制

要对农产品侵权责任进行研究,首先得明确农产品的概念,这是研究的逻辑起点。

#### 1. 比较法考察

外国法对于农产品的定义,按照是否将农产

收稿日期: 2014-09-09

基金项目: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科重大项目(Z109021303)

作者简介: 熊 闻(1987-),男,湖北武汉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品完全纳入产品而适用严格责任为标准,可划分为:

#### (1) 农产品是产品:美国、欧盟

美国《1990年联邦有机食品生产法》《美国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规定农产品为食品。考察《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第102条C款:“产品指具有真正价值的、为进入市场而生产的,能够作为组装整件或者作为部件、零件交付的物品。但人体组织、器官、血液组成成份除外。”可知,美国宽泛地将几乎所有可生产、能流通、有价值的物品视作产品,农产品也囊括在内。

欧盟通过的《关于协调成员国关于瑕疵产品责任的法律与行政规定的第85/374/EEC号指令》(以下简称“指令”)定义初级农产品是从土壤、养殖牧场和渔场获得的产品,不包括已经经过加工的产品。同时,通过其他立法将可供人类直接食用的农产品归类入食品。1995年5月10日,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通过颁布了1999/34/EG号指导的形式,修改了《指令》,将产品的范围扩大至未加工的初级农产品。

#### (2) 农产品不完全是产品:德国、日本

1990年1月1日生效的德国《产品责任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指的产品是指一切动产,包括构成另一动产和不动产之一部分的物以及电力。未经初级加工的土地上的、畜牧业的、养蜂业的和渔业的农产品(农业自然产品)不属于本法中的产品,捕猎产物亦同。”德国将农产品及狩猎物排除出产品外延。

日本《制造物责任法》第2条第1款规定:“本法所谓制造物是指被制造或加工过的动产。”《日本食品基本安全法》第2条规定:“本法中的‘食品’是指所有的饮品、食品,不包括药事法1960年法律第145号规定的医药品及与医药相关的产品。”因此,通过考察日本立法,未经加工的农产品是食品,除此之外的其他食品均属产品。

### 2. 国内法考察

根据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2条的规定:“农产品是指来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即在农业活动中获得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农产品还包括经过初加工的农产品,初加工是指对农产品进行一次性的、不改变农产品内在成分的简单处理,包括切割、去籽、净化、晾晒、冷藏等。我国《食

品安全法》第二条规定:“供食用的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以下称食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管理,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规定。”

食用农产品是指直接供消费者食用的初级产品,它包括直接在农业中获得的农产品及经初加工的农产品。农产品的最主要用途在于通过食用补给人类所需的养分。可见,食用农产品虽是我国法律的特有概念,但它是为了突出农产品的利用价值,仍是农产品的一种。

通过考察国内法发现,我国法律将农产品排除在了产品之外,农产品侵权不适用产品侵权严格责任。笔者认为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完整的概括了农产品的内涵及外延,是科学的。

## 二、农业耦合侵权分析

耦合是自然科学中经常用到的概念。移植到社会科学中,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体系、运动形式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互相影响或两种社会现象有机结合,针对某一客体,共同发挥作用<sup>[2]</sup>。笔者认为,因农产品致害的侵权行为具有耦合性,可以称之为农业耦合侵权。

### 1. 加害人身份的耦合性

农业耦合侵权的加害人是农业生产者。凡是从事农业(种植业、渔业、林业、畜牧业、副业)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就是农业生产者,包括通过合法流转程序获得农业用地使用权的非集体组织成员及其他组织。我国农业正走在实现全面现代化的路上,但就现况而言,农民仍是最主要的农业生产者。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表明,我国共有农业生产经营户1.98亿户,其中纯农户1.67亿户,占总量的84.3%。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估算,截止到2013年底,农村人口数量约有9.5亿,除去流动人口,实际留在农村并从事农业生产的约为7亿。可以说,农民乃农业之根本。之所有说加害人身份具有耦合性,原因如下:

其一,农业环境污染受害者身份与农业环境污染加害者身份的耦合。农业环境不同于农村环境。农村环境包含农民生活环境、农业生产环境及农村生态环境。农业环境是指影响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

的总和,也就是农业生产环境。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2014年4月17日联合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指出,我国耕地土壤环境不容乐观。从污染分布情况看,南方土壤污染重于北方;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部分区域土壤污染问题较为突出,而这些地区正是我国主要的粮食产区。受到污染或破坏的农业环境使得农田肥力降低、丧失;农产品质量下降、数量减产甚至绝收。农业耦合侵权加害人在此时处于农业环境污染受害人地位。

即使科学已有了重大进步,我国农业仍具有弱质性,对自然环境和条件的依赖色彩浓重。另外,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村沦为城市发展的附庸、食品和原材料的来源、以及污染物转移的去处。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受到负面激励的农民在土地投入确定的情况下往往采取减少其他生产要素投入的方式节约成本、提高产量、增加经济收益。在身为农业环境污染受害人的同时,农民亦是我国目前农村污染的主要加害人。以重金属镉为例,全球每年进入土壤的镉总量约为66万公斤,其中经施肥进入的比例高达55%<sup>[3]</sup>。《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指出,工矿业、农业等人为原因是造成土壤污染或破坏的主要原因。

有学者认为农民既是农村环境污染或破坏的受害者,又有可能是农村环境污染或破坏的加害人,将之称为农村环境侵权主体的复杂性<sup>[4]</sup>。笔者认为,“复杂性”表达不足以凸显农业环境污染中农民投、产行为的紧合与不可分割。耦合指明了一种相互联系、彼此影响而致联合作用的动态行为方式。农业生产伴生着农业环境污染,这是一种客观规律。农民获取市场信息能力不足以及不当诱导,加之日益增加的农产品需求催生出了怪诞的农业生产循环:即面对地力下降,相较自然恢复,农民选择通过加大投入农药、化肥及其他有机性农业生产资料提高产量→不当使用农业生产资料使土壤境况雪上加霜,农业环境容量趋于饱和→农产品质量上差强人意、数量上供给不足,农地自净不能,污染物数量逼近环境阈值,农地危机再迈上一个台阶。进一步阐释,农民的投入致害产出,产出刺激再投入,再投入再致损,如此往复。投、产行为紧密联动、互为因果,终致农民自利益与社会第三人他利益同

步不满足。农村环境污染法律关系中加害人与受害人身份的耦合联动,合力导出农产品侵权关系中农民加害人地位的现实可预见性。

其二,农产品致害侵权主体与对象耦合。农产品致第三人侵权的主体是农业生产者自不待言,农民此时处于加害人地位。我国农村人口数量庞大,农民是农产品市场上的最大消费者<sup>[5]</sup>。农村食品安全监管机制的缺位提升了农产品致农民人身、财产权益损害的可能性<sup>[6]</sup>。农民是农产品侵权最直观受害人。

一般侵权中,侵权人与受害人必然分离;主体重合会导致侵权行为的当然不成立,即行为不具有“违法性”。这并非不被法律包容:所有权的行权极端便是自我利益侵害。按照这个逻辑,农产品致害侵权陷入矛盾:从个案的侵权成立抽象出整体的侵权否定。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矛盾的原因在于无过错责任固化了主体地位,强令具有某些特征的一方为侵权人,另一方为受害人并赋权,双方地位恒定<sup>[7]</sup>。我国现行法律明确适用无过错原则处理环境侵权纠纷。笔者认为,农产品致害中农民身份耦合不阻却农产品侵权行为成立。笔者研究农产品致害侵权的目的在于以道义论的观点审视农业生产者特别是农民的可责难性,破解农产品致害侵权人归责原则构成的难题。从这个视角来看就要求突出农民的弱势地位,即农民亦深受其害。

## 2. 农产品致害侵权行为原因力耦合

侵权行为原因力学界鲜有论述。原因力是指致同一对象受害中每一原因对同一损害结果发生或扩大所发挥的作用力<sup>[8]</sup>。侵权行为原因力虽属法律事实,无涉价值判断,但对加害人最终责任承担的多寡具有决定意义。农产品直接脱胎于农业生态环境,农业生态安全与否直接决定农产品安全。农业生态安全系统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系统之间的流传递使两系统存在天然的功能耦合。大气、水、土壤、地质、动植物等农业生态系统环境要素是农产品直接的生产要素,这些环境要素形成两系统的天然交集。一方面它们作为农业生产的生产要素,可以视为农业生态环境系统对农产品生产系统的“源能力”;另一方面它们对农业污染物的吸收、转化,可以看作是农业生态环境系

统对产品生产系统的“汇能力”<sup>[9]</sup>。

目前我国农业生产方式仍以外源性技术为主。所谓外源性技术是指非自然的、在自然生态循环中难以消解或消解会给生态环境带来破坏的技术,主要包括以“烃”为化学基础的石化技术、农作物转基因技术及其他生化污染技术。外源性技术强行改变了动植物生长规律、污染了食物链的传递,为农产品质量安全蒙上阴影<sup>[10]</sup>。以湖南“镉大米”为例,大米中的镉来源并非局限于农民不当耕种行为,酸雨污染、大气干湿沉降、土地重金属底值偏高、地表水地下水交叉污染都是促成镉大米事件爆发的元凶。因此,多方原因力的聚合且不可分应当是农产品致害责任研究的逻辑起点。

由此看出,农业生产环境是个开放的系统,工业污染物的转移、城市生活垃圾的失当处置及生产、生活废水的随意排放等极易对农业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甚至作为生产要素直接进入农业生产循环。当被污染的环境要素实现其农产品生产要素功能时,其二重性功能便产生了冲突,导致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产生<sup>[9]</sup>。

笔者认为,农产品致害侵权的原因力交织、复杂,且得依毒理学、生态学、病理学等客观规律支撑,又伴随工业化社会大生产环境问题遗留、农业生产经济利益驱动、基层劳动群众环境意识缺失等社会助力,使得农产品致害侵权原因力合纵联结、互为力源。在现有医疗技术及科学技术条件下,难以辨别原因力的主次、前后及它们分别对危害结果“贡献”力的多寡,原因力分割不能致使侵权责任现实分担不能,司法者只得依据“为损害找救济”的直白逻辑,以“无过错原则”为刃,强制割裂“隐性间接致害人”向“显性直接致害人”演进线路。判例法制度舍弃使司法者无力赋予位于侵权行为原因力链条中末端的致害人向其他“隐性间接致害人”追偿的权利,明显有失公允,难以维持法律的公正性。因此,在不稳定的外部经营环境下,从实现受害人权利救济最便利原则推论,农产品质量控制研究不能仅停留在农产品质量法律体系的结构优化层面,还应拓展到农产品致害侵权的社会化救济制度构建上。

### 3. 侵权过程耦合,难以判明真正侵权人

农产品普遍带“毒”使得侵权过程呈现一种不

停顿的动态行进表象:即侵权过程持续、渐进、集聚。有毒、有害物质积累到一定阈值时,危害结果发生。近来对慕尼黑以及法兰克福等地进行的随机抽样显示约6.5%的儿童体内残留较高数值的聚氯联苯,这提示了有机磷农药具有富集作用<sup>[11]</sup>。按照侵权责任因果关系理论的近因原则,最后侵权人既视为直接加害人,这显然并不契合农产品致害侵权的耦合性。囿于各人体质对毒害农产品耐受程度不同、毒害物质在人体中发挥毒理作用机制所需时长差异等客观要素,侵权过程耦合致使侵权近因及最后直接加害人不断被“修改”,判明真正侵权主体较之一般侵权与环境侵权具有更大的难度。

农产品致害侵权的过程耦合体现在:一是同质农产品生产者人数庞大,在农业生产环境已形成面源污染的背景下,食用者购买的致害农产品只能确定到种类及产区,不能确定具体的生产者;二是毒理作用发挥需时,农产品携带毒害物质的种类、性质、含量有差异,毒性物质在体内参与循环,互为因果,共同致损,难以诊断哪一种物质是主要致害物,就难以依据疫学因果关系确定具体侵权人;三是生态环境的整体恶化如大气雾霾、污染的饮用水会和体内积蓄的毒害物质发生化学、生物反应,仅仅要求农业生产者承担致害侵权责任缺乏分配正义。

### 4. 侵权行为的致灾性耦合

食用农产品安全问题主要取决于农业土壤安全与否,而土壤污染又是一种典型的人为致灾,它表现为人为致灾性、公共政策致灾性和地方控制机制不力致灾性<sup>[12]</sup>。农产品致灾性主要体现在公共政策及控制机制不力致灾性上。

目前,我国农产品质量监管法律体系表现为以《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为部门基本法,《农业法》《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标准化法》《渔业法》《草原法》《动物防疫法》《种子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单行法中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及法律责任的特别条款为附属法,兼有《兽药管理条例》《农药管理条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和共计2411项的农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现行监管体系的特征是法律规

章效力多层次、行政监管机关多元极、监管职权多交叉，将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流程过度分解并赋权不同部门监管，不难想象会出现某些侵权行为会遭遇管理真空或管辖竞合。2009年颁行的《食品安全法》确定了由国务院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作为核心部门牵头监管食品安全问题，但《食品安全法》却将食用农产品排除出食品安全法监管范围。相应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立法中也缺少针对某些农产品的规定，如渔猎产品和采集产品。食用农产品侵权致害原因力耦合要求政府在农产品质量把控环节中占绝对主导地位，政府监管散逸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如使用垃圾肥培育的蔬菜价格相对低廉，一旦逃脱监管、进入市场将会产生“格雷欣法则”<sup>①</sup>效应。现行法律中对政府监管责任失当的法律惩处落实在负有监管职责的个人，忽略了政府主体地位，对于防控农产品质量危害约束不足。笔者认为，食用农产品安全监管制度供给严重匮乏是公共政策致灾性的具象。

侵权行为致灾性在频发的农产品安全问题中显现出“三剥”属性——农产品市场优质品价值剥夺、市场消费人群权益剥蚀、市场服务型政府声誉剥离。致灾性耦合使农产品侵权事件的控制与预防陷入既不能仅诉诸于制度，通过加强立法与日常监管以及惩戒措施来实现，也不能完全交给市场的困境。因此，笔者认为因食用受污染农产品致害侵权是一种特殊的农业环境侵权，因其具有耦合性，也称农业耦合侵权。利用“种+属”的方法，笔者将农业耦合侵权定义为：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因农业生产者人为活动和其他原因，致农业环境介质污染或破坏造成未经加工的农产品积蓄毒害物质，以食物链等方式进入人体造成第三人人身、财产权益损害或有损害之虞而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

### 三、 农业耦合侵权的社会化救济思考

农业耦合侵权既不同于一般侵权，也有别于环境侵权，它是农业环境侵权的特殊表现，具有以下特征。

#### 1. 有危害之虞的现代农业生产的社会正当性及准公益性

农业与人类存续的天然不能割裂奠定了农业生

产活动的道义不可责难伦理基础。人类在农业现代化中对经济效益与生态保护选择性地进行了价值位序排列，借环境法价值“二元目的”之名行经济优先之实阻却了农业生产的正当性为农业耦合侵权提供辩护。笔者认为，库兹涅茨曲线(EKC)<sup>②</sup>为这种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农业耦合侵权的可责难性来源于人类生产力提高下对生态系统自净能力的占有失措。追逐最大利益驱动现代农业的发展，但不可否认农业生产的准公益性，农产品消费面及全体公众，农业耦合侵权易诱发群体性事件——从这个角度来看，优质、安全的农业生产可分担部分政府秩序管控职能即维稳。我国取消农业税、发放农业补贴等一系列税收优惠、财政补助政策也集中体现农业生产的准公用事业性质。

#### 2. 侵权客体的私益性

所谓私益，是指从事实上或法律上可分的专属于自己的利益。私权保护私益。农业耦合侵权的客体是第三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有学者认为环境权也是环境侵权的客体，笔者不赞同。环境权是一项人权，人权高于其他权利；人权不因政权更迭而丧失，这一点是以国家强制力而后盾，必须通过国家立法制定或认可的私权所不能比肩的，环境权不可能成为农业耦合侵权的客体。

#### 3. 侵害过程的隐秘性和连续性

农产品的生产需要一定的周期，农产品在成熟上市前一直都与农业环境紧密联系，不可分离。农业环境介质受到污染或破坏后，通过农场品(动植物及其制品)自然的萌芽、生长、发育、成熟，转化或进入农产品中，以食物链的方式传递再被

<sup>①</sup>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指在实行金银复本位制条件下，金银有一定的兑换比率，当金银的市场比价与法定比价不一致时，市场比价比法定比价高的金属货币(良币)将逐渐减少，而市场比价比法定比价低的金属货币(劣币)将逐渐增加，形成良币退藏，劣币充斥的现象。人们用这一法则来泛指价值不高的东西会把价值较高的东西挤出流通领域。见 <http://baike.baidu.com/view/4240.htm?fr=Aladdin>。

<sup>②</sup>该曲线主要表达了大多数污染物的变动趋势与人均GDP的变动呈倒“U”型关系。见 Grossman G, Krueger A.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110(2):353-377。

人体吸收造成伤害。同时,农业环境污染通常会给人一种“点源性”污染的错觉,使人夸大了环境的自净能力,忽略了环境容量,放纵了“看不见的伤害”。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54条规定了农产品安全质量侵权纠纷适用无过错原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6条规定了农产品经营者的产品责任,其适用法律来源为《产品责任法》。笔者认为,现行法律制度没有注意到农业耦合侵权的特殊性,仅依一般侵权理论确立了无过错的归责原则,倚重侵权责任法的惩罚作用,在平衡侵权人与受害人利益之间取舍失范,背离了“立法的价值在于对相互对立的利益进行调整,对它们得以满足的顺序进行安排”的立法取向。

多年来,诸多学者倡导环境侵权责任的社会化救济,并在我国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形式实现。2007年,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保监会联合印发《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启动了环责险政策试点工作。2013年,环境保护部与保监会《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明确了试点企业范围、责任范围和理赔机制等等。新近颁布的《环保法》第52条明确规定国家支持投保环境责任保险。“绿色保险”在我国方兴未艾,生气勃勃。尽管环境侵权责任社会化救济的提出曾引起学界震荡,引发侵权法将消亡的哀叹,但笔者认为环境侵权责任社会化救济乃是平复现行立法中对侵权法价值取向选择的失衡——惩罚高于补偿;回归侵权法的初衷——补救功能的实现。

笔者认为,农业耦合侵权的社会化救济方式当以保险为首选。考察农业保险、“绿色保险”、农村环境责任保险<sup>[13]</sup>、农业环境保险<sup>[14]</sup>、农业环境责任保险<sup>[15-16]</sup>等诸多概念,将农业耦合侵权责任纳入农业环境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最为合适。所谓农业环境责任保险是指农业环境责任保险即是指以农业生产者在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中造成环境污染或破坏而应当承担赔偿或治理责任为标的的保险。在这种保险制度中,农业生产者作为投保人预先向保险人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当农业生产者因从事农业生产活动造成环境污染致人损害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时,保险人则在约定的责任限额承担赔偿责任<sup>[17]</sup>。将农业耦合侵权责任纳入农业环境责任保险的承保

范围的理由有三。

其一,农业耦合侵权的大规模侵权特征。农业耦合侵权与共同侵权有相似之处,即侵权关系法律关系主体复数。但两者视角截然不同:农业耦合侵权关注复数被害人,共同侵权关注复数加害人。农业耦合侵权具有大规模侵权特征,提示了农业生产者处于较高的“消极”利益可得风险中——既极有可能承担对不特定多数社会第三人的赔偿责任。农业环境责任保险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分散农业生产者,特别是农民,在生产过程中伴随的高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风险。农业耦合侵权作为农业生产的副产品之一,与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行为一同进入农业环境责任保险视野是理所应当的。

其二,无过错原则催生了农业耦合侵权对农业环境责任保险的需求。农业生产者(农民)的弱势地位、公法未穷尽下的政府监管缺位以及“一刀切”的农产品质量侵权归责路径合力制造了司法实践中“有判决,难执行”困局。事实填补不能的救济更加深了受害人的悲观情绪。新《环保法》第64条原则性的规定了环境侵权争议解决的适用渊源——《侵权责任法》,但对农产品侵权没有做特殊规定。《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确立的无过错原则顺应了特殊侵权归责原则演进的规律,却罔顾了现实可操作性。有学者呼吁过错原则的回归<sup>[18]</sup>。农业环境责任保险的政策性与强制保险模式的联合可以破解无过错原则给农业生产者带来的“囚徒困境”,笔者认为在细化农业环境责任保险具体制度设计时借鉴《保险法》的第三人代位求偿权是一项针对性的解决对策。

其三,农业环境责任保险能最大程度的实现农业耦合侵权社会化救济。农业环境责任保险可将农业生产者道德失范成本内部化、分散化。“因污染者没有财力,故实际上无法追究其损害赔偿责任和净化责任,这样被害者和政府就必须负担这个费用,对这样问题的解决,保险也能发挥作用”<sup>[19]</sup>。对受害者而言,权利的尽快恢复是心中诉求;对于政府而言,保护和改善环境,保障公众身体健康是法定职责。新《环保法》第21条、第50条为政府通过财政手段保障农业环境责任保险保费收入提供了法律基础。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农产品致害侵权因其耦合性不能纳入产品责任范畴,也不能按照一般环境侵权处理。从本质上说,它是一种特殊的农业环境

侵权,尽快建立农业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对农业耦合侵权社会化救济的实现具有制度化意义。

### 参 考 文 献

- [1] 薛晋文. 影视文化创新从何入手[N]. 光明日报,2014-03-22(9).
- [2] 宁德业,尚久. 当前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J]. 江西社会科学,2010(4):190-194.
- [3] 王爱玲,杨晖. 我国媒介的消费主义文化表现及其文化品格探析[J]. 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1-7.
- [4] 高元龙. 试论文化品质低下的原因及优化对策[J].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74-77.
- [5] 黄式宪. 侯孝贤作品的人文亲和力及其文化品格[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1-10.
- [6] 王三运. 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J]. 求是,2011(24):16-19.
- [7] 王鹏. 论双方无过错责任侵权行为[J]. 兰州学刊,2013(10):141-145.
- [8] 张新宝,明俊. 侵权法上的原因力理论研究[J]. 中国法学,2005(2):92-103.
- [9] 豆志杰. 农业生态安全与农产品质量安全耦合系统协同发展研究:以吉林省为例[D]. 长春:吉林农业大学,2013.
- [10] 杜龙政,汪延明. 基于生态生产方式的大食品安全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2010(11):36-46.
- [11] 郝丹丹. 蔬菜农药残留原因及其危害性分析[J]. 现代园艺,2013(6):66.
- [12] 王建平. 土壤污染灾害的致灾性三论:以“谁污染谁治理”原则失效为视角[J]. 社会科学,2013(7):92-102.
- [13] 侯娟. 我国农村环境责任保险法律问题研究[D]. 武汉:华中农业大学,2013.
- [14] 刘飞,杨园园,陶建平. 我国农业环境保险发展的可行性与经营模式研究[J]. 湖北农业科学,2011(11):2550-2554.
- [15] 刘建朋,贺志亮,王育才. 我国环境责任法律制度探讨[J]. 中国经贸导刊,2012(16):75-77.
- [16] 彭刚红,王育才. 农业环境侵权与农业环境责任保险探索[J]. 贵州农业科学,2013,41(3):156-160.
- [17] 彭刚红. 我国农业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研究[D]. 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3.
- [18] 薄晓波. 回归传统:对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反思[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17-27.
- [19] (日)黑川哲志. 环境行政的法理与方法[M]. 肖军,译.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155.

=====

(上接第12页)

“损害环境责任终身追究;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扩征资源税抬高污染成本;保护修复生态将陆海统筹。”这是自然之内涵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进程当中的具体表现,展示了我国在贯彻落实“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当中”全新的力量和蓬勃的

生命力。

综上,要完整地把握自然内涵的历史进程,我们就应该让自然如她自身所愿那样显现,以自然之眼看待自然,如此才能够协调好自然与人的关系。同时当以母性善待万物,从而更好地破解二元论的思维模式,更科学地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出新的理论依据,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 参 考 文 献

- [1] 李平.世界妇女史[M]. 海口:海南出版社,1993:9-11.
- [2] (美)凯瑟琳·克莱,钱德里卡·保罗,克里斯蒂娜·塞内卡尔.世界妇女史[M]. 裔昭印,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4-5.
- [3] 傅佩荣.傅佩荣解读老子[M]. 上海:线装书局,2006:13-14.
- [4] 王辉. 易经[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202-203.
- [5] (英)斯蒂芬·R·L 克拉克.生物学与基督教伦理学[M]. 李曦,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39-242.
- [6] 卡洛琳·麦茜特.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M]. 吴国盛,译. 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358-359.
- [7] (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 李强,译. 北京:西苑出版社,2004:274-275.
- [8] 南宫梅芳,朱红梅.生态女性主义[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14.
- [9] 杨大春.含混的自然概念:梅洛·庞蒂对笛卡尔自然观的批判反思[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11):7-12.